

语言观的转变：从工具论到本体论

惠秀梅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语言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中外学者给出了各自不同的界定。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语言工具论，即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工具是语言的一种功能，但语言不仅仅是工具。以工具界定语言，遮蔽了语言的本质，割断了语言与人、语言与民族精神和文化、语言与存在的内在联系。语言更是一个在者/是者 (beings, сущее)，是一个特殊的实在。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世界也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述说。所以，语言中既有人形象，也有世界的形象。只有以语言本体论为指导，才能认清语言的本质，揭示人及人的世界。而语言本体论的哲学基础则是多元实在论。

关键词：语言观；工具论；本体论；多元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1 语言是工具

在西方哲学中，语言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之一。就语言的本质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深入的见解。关于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潘文国收集了中外 68 种关于语言的定义（潘文国 2001：97—101）。在这众多的定义中，列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工具”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交际工具说’最早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后来列宁加上了‘最重要的’这个修饰语，再经过斯大林的阐发，便成了社会主义诸国对语言性质的经典定义，反过来又为西方国家所采用。”（潘文国 2001：106）

在西方，“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这一提法虽说是在18世纪出现的，但是语言工具论的思想却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指出，《克拉底鲁篇》就体现了柏拉图的语言工具论思想：“语言是工具，是对来自原型、事物本身这一类东西的描摹、制作和判断。”（伽达默尔 2004a：528）把语言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为我们提供的起点，他的逻辑著作被命名为《工具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江怡 2005：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语言本质的这种工具论思想在以后的形而上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以致伽达默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语言，使语言的本质深深地陷入遮蔽之中”（黄小洲 2010：30）。

表达思想，用于交际，这些都是语言的一种功能，而不是语言的本质。语言工具论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工具论遮蔽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的工具，进行交际的工具，也是人们认知的工具。这些说的都是语言的功能，并非语言的本质。工具功能是语言的属性之一，而非全部。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一个特殊的实体，一个在者/是者（beings, сущее）。

“将一个事物的功能代替‘本身的存在是什么’……固然是方便得很，但这个事物就会与其他具有同样功能的事物混同起来，这对认识事物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用功能定义事物，事物本体的存在都会被功能淹没，对认识该事物并无本质上的揭示。”（钱冠连 2001：3）“各个时代的多数哲学家都按‘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考虑问题，即是说，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这与现代把语言当成思想或存在本身大异其趣。”（徐友渔等 1996：3）

李洪儒曾指出，在人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人的意识世界，将意识世界进行编码，就是语言。语言中既有人形象，也有世界形象。“当人透过语言的棱镜看世界时，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是该种语言所分割整理过的世界。”（陈波 1998：364）所以，如果把语言降低到一种工具的地位，就不能把握语言包罗万象、构造世界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真正认清语言的本质。

第二，语言工具论割裂了语言和人的本质联系。按照语言工具论的观点，语言只是服务于人的外在工具。这就把人凌驾于语言之上，使语言处于人的控制之下，成为人任意支配的对象。

语言只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这就意味着思想是第一性的，在先的；语言是第二性的，在后的；而且思想可以和语言分离。这样，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来表达思想完全取决于人。“语言文字和思想情感不可分离之处也仅仅在于：语言文字的工具形式有时也会影响到思想情感的表达效果。”（郜元宝 2002：42）但是，“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绪尔 1999：157）

“假如语言的功能仅仅在于表达，即传递思想、情感，对于人类来说语言就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人同样可以用其他符号或非符号的手段进行自我表达（尽管不一定像用语言那样有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语言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只在语言中思维、感觉和生活’。”（姚小平 1995：134）可见，语言不仅仅是人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思想是人的思想，语言也是人的语言，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可以说思想和语言同一，语言和人同一。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人。所以，李洪儒一再强调，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通过语言分析，可以揭示人及人的世界。（李洪儒 2007：11）在洪堡特的研究中，语言研究是对人研究的一部分。

“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的词汇大不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放回到由我们支配的储备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

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伽达默尔 2004b: 63）

语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语言工具论将人和语言分离，在肯定了人对语言的支配地位的同时，也否定了语言与人的本质联系。

第三，语言工具论否定了语言和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之间不可选择的亲缘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嬗变，与它的语言密切相关。正如萨丕尔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1929)一文中所说，语言“强有力地制约着我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过程的所有的看法……‘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关集团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两种语言相似到可以认为代表同样的社会现实”（萨丕尔，转引自于全有 2011: 45）。罗马帝国的分裂和中华民族的始终统一，证明了语言在维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狄奥多西一世统治罗马帝国期间，公元 392 年，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存在两种语言，那就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东部教会和西部教会难以融合的原因，正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字对《圣经》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其实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为了帝国的安定，为了巩固家族的统治，狄奥多西一世在弥留之际，亲手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交给两个儿子。说拉丁语的区域后来被称为西罗马帝国，讲希腊语的地方则称为东罗马帝国。

语言文字的不同，加剧了欧洲由治到乱。虽然《圣经》依然是这块大陆上主要甚至唯一的共同读物，但不一样的语言习惯已经和那 20 多个字母相结合，酝酿着不同的文字。欧洲大陆的分解，已经是注定的事了。

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政权怎么更迭，朝代怎么变换，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一直维系了下来。这和我们的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关系。秦始皇做了两件大事，后人永远都记得，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统一汉字，统一文字。（《汉字五千年》2009: 16—28）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统一文字，也就是统一了语言的理解和运用。

“语言介于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之间，是一个特殊的中间世界，一种创意不息的力量；它把物质的世界转变为精神财富，从而形成文化造就历史。”（姚小平 1999: 53—54）

萨丕尔认为，“语言、种族和文化不一定互相关联”，“语言的发展以及种族文化的特殊发展这二者之间没有深刻的因果关系”（萨丕尔 1997: 193, 194）。按照萨丕尔的定义，“文化指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语言则指人具体地怎样思想”（萨丕尔 1997: 195）。“文化是内容，语言是形式，是记录和表达文化这种方式。文化有文化的‘沿流’（drift，按指发展和变化的去向），语言也有语言的‘沿流’，二者平行前进，但没有必然的联系”（姚小平 1999: 58）。这是坚持语言工具论的必然结论。

如果语言仅仅是工具，它会使语言和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偶然化、暂时化，否定语言同一个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没法证明语言形式民族气质（民族精神——引者）有任何一点联系。语言变异的倾向，它的沿流，顺着历史先例给它规定的渠道无情地向前流淌；它不顾及说话人的情感和情绪，就像一条河的河道不顾及当地的大气湿度一样。我（萨丕尔——引者）十分相信，从语言结构里找分别，以相应于据说是和种族有关的气质变异，那是徒然的”（萨丕尔 1997: 195）。

在中国，否定语言与民族精神和文化之间不可选择的亲缘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五四

前后直到三十年代一直流行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句口号，表面上把语言文字问题提到了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实际上只不过预设了一个前提性的暗示：汉字是汉字，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继续存在，甚至将得到更大的发展”（郜元宝 2002：42）。

但是，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都在它的语言里。语言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洪堡特 1999：52）

第四，工具论割裂了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语言问题和本体论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语言问题谈到深处就遇到了本体论问题，而要把本体论问题讲清楚，又必须考察语言。本体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但是为要追问一个东西的存在，就要弄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于“是什么”的问题，就要从语言的角度考察。要弄清楚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就要弄清楚语言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张庆熊 2008：55）

如果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那么它对现实就只能起到一种描写或再现的作用，或者说，只起到一种镜像式的反映。在维特根斯坦之前，一般认为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事物由词语表达。但是，“事物的简单相加反映不出世界的本来面貌，就像一张家具清单反映不出房间的面貌一样”（徐友渔等 1996：55）。所以，语言工具论不能使我们认清世界的本来面貌。我们不仅要知道世界上存在什么东西，而且还要知道这些东西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维特根斯坦 1999：25）。相应地，描写世界的工具就是句子。但是，即便“语言对现实的表现或描画，不是如照片、写生或素描与景物的关系，而是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徐友渔等 1996：54），但世界的逻辑结构也是存在于语言中的。而且，这里的语言并不是自然语言，而是维特根斯坦的理想的人工语言。

语言不仅仅是人认识世界和描写世界的工具，它更是一个特殊的实在。“语言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一开始便与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杨国荣 2004：17）世界是人的世界，但是人的这个世界只有在语言才能得到述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伽达默尔 2004a：538），“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伽达默尔 2004a：588）。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9：85）当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时，也就意味着语言与存在的某种重合。万物在语言中出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语）。“这里所说的存在，既是指世界之‘在’，也指人自身之‘在’，与此相应，以语言为存在的家，既肯定了语言是把握存在的方式，也意味着将说明世界（以语言为手段说明世界）规定为人的‘在’世方式。”（杨国荣 2004：18）

“把语言定义为交流信息促进理解的工具……只不过指出了语言本质的一点效用。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海德格尔，转引自徐友渔等 1996：159），它更是一个特殊的实在，一个在者/是者。

2 语言是一个特殊的本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中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之后，哲学家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与以前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语言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或手段，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它构成我们生存的方式，是我们存在的家园。这样，语言就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

关于语言本体论的研究，存在以下情况。“一种是在 beings（在者/是者/有者，本体）确定的情况下，集中研究 beings 的在、是和有，比如始于古希腊、延续至今的具有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各个哲学流派。另一种是在 beings 还不确定的情况下，或者首先论证研究对

象是 beings, 然后探讨对象的在、是和有; 或者不分先后顺序, 同时或交叉展开研究, 比如本体论语言哲学。”(《外语学刊》2008 年第 5 期“语言哲学”栏目编者按) 目前, 多数研究属于第一种情况, 即在“语言是本体”的前提下展开研究, 而论证“语言是本体”的研究则比较少见。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索绪尔关系极大, 他使哲学对语言的注意力转向语言结构自身。”(徐友渔等 1996: 199)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他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 但是其思想中却蕴涵着这种语言观, 甚至可以说, 他把语言是在者/是者作为自己建构语言学理论的预设。”(李洪儒 2008: 22)

索绪尔本着二元对立的原则, 区分出语言和言语、能指与所指、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共时与历时、价值和意义等二元对立范畴。李洪儒(2010)也正是从这几对范畴出发, 阐述了蕴涵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中的语言本体论预设, 论证了语言是在者/是者的思想。他指出, 索绪尔通过语言与言语的对立, 确定了自己的语言学只研究那些具有普遍性、社会群体性、规律性等特点的语言。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对立, 确定语言基本单位——具有心理性质的“符号”。通过聚合与组合两种关系, 建构出具有社会性、心理性特点的语言。从共时与历时这一方法论角度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共时断面上的语言, 以此把语言的历时态抛出自己的研究视野。通过价值和意义, 索绪尔凸显出关系和差异的重要性。语言单位及其系统依靠单位间的关系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依靠单位间的差异确定各单位的价值。语言是个社会符号系统, 它依靠规则实现自己的运作和存在, 成其为自身。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语言单位和语言规则的描写性探索表明, 语言是一个具有自己组成单位及其运作规则的特殊存在。而语言这一存在的核心要素是创造、发展、运作(使用)语言本体的关键要素——人。与本体语言的两种存在方式——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相对应, 语言中的人也可以分为群体人和个体人。群体人的存在家园是语言, 个体人的栖息寓所是言语。就语言研究而言, 在语言和群体人的层次上, 主要应该关注语言的普遍性、群体性、规范性或规则性, 它们对于个体人来说具有客观性、规范性和强制性。对言语研究来说, 则应该主要关注言语的特殊性、个体性、现实性、变异性, 它们与个体人对语言和言语的使用、构拟、解读相联系。这样, 对本体语言(语言和言语)的研究就与对人(群体人和个体人)的研究结合了起来。(李洪儒 2010: 17—24)

语言所有的规则及其存在方式都产生于言语中, 语言具有自足性。正是这种自足性决定了语言既不同于世界, 也不同于人, 而是一种特殊的“实在”。

3 语言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多元实在论

“当语言哲学进入 20 世纪门槛的时候, 它的预设条件和哲学基础是语言的客观性。”(高云球 2008: 1) 语言是一个具有实在性的特殊本体, 语言本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多元实在论。

西方哲学家大部分坚持身心二元论, 也有人坚持一元论。除了一元论和二元论之外, 还存在着多元论的倾向。波普尔认为, 在西方哲学史上,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超出了身心二元论的范围, 因为“它既非人格神的世界, 又非意识的世界, 也不包括某种意识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客观的、自主的、存在于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以外的第三世界”(波普尔 2001: 164)。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引出了一个三分的世界。

根据波普尔的多元实在论, 世界至少包括三个在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亚世界, 它们是: 第一, 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世界, 被称为世界 1; 第二, 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 或关于活动行为意向的世界, 被称为世界 2; 第三, 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 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 被称为世界 3。这三个世界的关系是: 前两个世界相互作用,

后两个世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世界 1 和世界 3 要以世界 2 为中介，只有通过世界 2，世界 1 和世界 3 才能相互影响。（波普尔 2001：114，165）这三个世界的区别是：世界 3 是一个客观精神或客观知识的世界，它是“精神”的，区别于世界 1 物质性；它是“客观”的，区别于世界 2 是主观性。

波普尔的知识论有两个基本思想：知识是客观的，本质上是猜测性的。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他说，“科学依靠人的创造精神和批判理性，通过不断地创造解说和排除错误的而持续增长”。“但是他的科学发展图式是个纯粹逻辑的抽象形态，是科学发展的理想模型。这是抽象了一切人类情感的理性的自我展开，是一个波普尔自称的‘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纪树立 1992：25）也就是说，波普尔的世界 2 是一个不包括人的主观情感的世界。但是，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情感，抽象掉情感因素的人是不真实的人。因此，李洪儒对人的世界进行了重新界定，指出人的世界包括“外在物理世界、内在心智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李洪儒 2010：22）。这是对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这样，根据多元实在论，语言也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实在。从作为本体的语言来看，我们认为语言属于世界 3。从语言与三个世界的关系来看，语言的功能有所不同：它描写外在物理世界，外显内在心智世界，创造主观世界。（何煦之 2007：4）

4 结束语

工具是语言的一种功能，但是语言不仅仅是工具。以工具界定语言，遮蔽了语言的本质，割断了语言与人、语言与民族精神和文化、语言与存在的内在联系。语言更是一个在者/是者，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特殊实在。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世界也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述说。因此，语言中既有人形象，也有世界的形象。只有以语言本体论为指导，才能认清语言的本质，揭示人及人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陈波. 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高云球. 试论语言本体论的哲学基础[J]. 外语学刊，2008(5).
- [5]郜元宝. 现代汉语：工具论与本体论的交战——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观念的思考[J]. 当代作家评论，2002(2).
- [6]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下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a.
- [7]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b.
- [8]《汉字五千年》编委会. 汉字五千年[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9]黄小洲. 浅析伽达默尔对语言工具论的批评[J]. 求是学刊，2010(6).
- [10]纪树立.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编译前言[A].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 [11]何煦之. 语言世界与语言功能[J]. 外语学刊，2007(5).
- [12]卡尔·波普尔. 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13]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J]. 外语学刊，2007(4).
- [14]李洪儒. 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研究——站在流派的交叉点上[D]. 黑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8.
- [15]李洪儒. 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J]. 外语学刊，2010(6).
- [16]江怡. 英美分析哲学（上），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八卷[M]. 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 社, 2005.
- [17]潘文国. 语言的定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 [18]钱冠连. 不当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二)[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2).
- [19]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0]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1]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尚 杰.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22]杨国荣. 本体论视域中的语言[J]. 江海学刊, 2004(2).
- [23]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24]姚小平.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译序[A].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5]于全有. 20世纪以来人类有关语言本质问题的探索历程[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 [26]张庆熊. 本体论研究的语言转向——以分析哲学为进路[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Change of Concept in Language: from Organon to Ontology

HUI Xiu-mei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an instru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thought.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covers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Language is not only an instrument, but also a special being. There are human images and images of world in language. So only by ontology of language can we real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and bring to light human and human's worl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ontology of language is pluralistic realism.

Key words: language concept; organon; ontology; pluralistic realism

作者简介: 惠秀梅(1969—), 女,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学, 语言哲学。

收稿日期: 2013-02-26

[责任编辑: 惠秀梅]